

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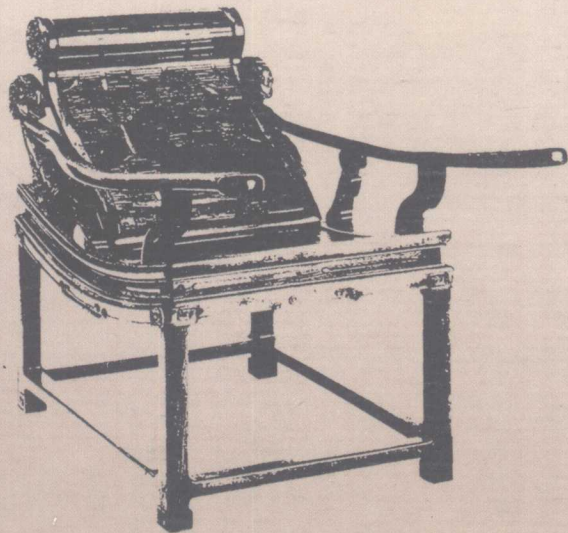
定宜庄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本书的访谈围绕着“人”展开，关注的是人和人的生命史，正是这些人的生活、生命，才构成了一个城市的灵魂与神韵，是研究一个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 作者把这五十多人的口述，用来作为展现老北京人性格与为人特点的方式。将北京人放在北京这个特殊的地域、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反过来也通过北京人，来看北京这座城市和它的历史。

■ 常言说得好，理论永远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被访者口中和心中的那座北京城，还有京城中百姓们过的日子是那样的五光十色、摇曳生姿、饱满多汁、妙趣横生……



ISBN 978-7-5004-8196-6



9 787500 481966 >

定价：110.00元（上下册）

定宜庄◎著

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

下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目 录

下册

第二卷 外城编

“天留忠骨伴将军”	530
(一) 余幼芝口述	532
(二) 张先生口述	549
阅尽人间春色	
——刘曾复口述	556
不让须眉是此行	594
(一) 李滨口述	596
(二) 萧成口述	626
回民开的买卖	
——满恒亮口述	638
红尘内外九十载	
——李荣口述	662
坛根儿下的日月	
——王春茂、严秀芹夫妇口述	683

第三卷 城郊编

那条进京的古粮道

——刘子扬口述	702
架松,架松	
——白四口述	723
“勤行”的手艺	
——张强口述	739
坟户春秋	
——何淑玉口述	752
清华园边“内三旗”	
——司文琴口述	758
蓝靛厂几代回回之后	
——金宝琴口述	770
西苑一条街	797
(一) 周桂芳口述	798
(二) 高淑瑞口述	815
圆明园变成废墟以后	
——李新建、陈之林口述	833
京北回族第一村	
——黄炳成、李守勋口述	847
结语	867

第二卷 外城编

外城也称南城，是相对于内城而言的。清军入关，将京城汉人悉数驱赶到外城，外城从此成为汉人亦即相对于旗人的“民人”聚居之所。内城在北，外城居南，彼此被一重城墙阻隔，往来的通道只有“前三门”：宣武门、正阳门与崇文门。旗人固然不得随意迁往外城，外城民人想要在内城长久安居也同样困难，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清亡，甚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仍没有彻底打破。我访问的诸多人士，汉人后来居住于内城者有之，但旗人却无论宗室平民，尚没找到一例居住于外城者，20世纪50年代之后当然不算。

我曾多次在文章与讲演中抱怨，说北京史的研究者总是将目光集中于外城，甚至把外城当作北京的代表与中心加以展现。我说凡写老北京的作品，总是津津乐道于前门外的繁华、宣武门外的会馆，还有天桥的把式。但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解，也是事出有因。外城是五方辐辏之处，集中了从全国四面八方迁移而来的商人、小手工业者和从事五行八作的百姓；外城还是各地官僚、士子汇聚的中心，是自辛亥革命以来各种暗流涌动的革命思潮的策源地。外城还有林立的戏台、酒楼、饭店和妓院，是京城最热闹的娱乐场所……总之，如果不去深究，那么内城的文化确实显得封闭而单一，不似外城开放而丰富；内城作为大兵营所特有的清冷肃杀气氛，确实不似集聚了大小商号与手工作坊的外城繁华红火；内城的死气沉沉与外城的生气勃勃构成了鲜明对比，内城的“旧”映衬着外城的

“新”，难怪有学者认为，从功能上看，从社会空间联系上看，外城似乎比内城更像一个城市。^①

哪里更像一个城市，不是我在这里应该讨论的问题。与在内城一样，我关注的问题仍然是同一个，即这里生活着的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处于哪种空间环境之下，哪种社会群体之中，有着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怎么记忆这个城市和他们祖先的历史，又怎样看待自己的生活。

与内城不同的是，我无法将我在外城所作的访谈，按照社会群体予以分类，这当然也与我选择的样本数量不够有关。因为我开始选择被访者的时候，并没有特别注意这个人在京城居住的地区，直到最后按地域分类，才发现被访者居住于内城尤其是东城的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各处。但另一方面，外城的人形形色色，确实也很难将他们分别归入哪一个圈子，他们中还很少人有能力和时间来编织起自己的社会网络，大多数人甚至还未找到自己归属的社会群体，这是外城流动人口多、迁徙频繁的结果，也是它仍然处于边缘而非中心位置的体现。在我访谈的外城诸人之中，绝大多数都在辛亥革命前后才从外省迁移来京，就是很好的证明。

所以，“外城编”的这些访谈，就都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群体的顺序排列的。

^① 参见赵世瑜、周尚意《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概说》，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第112—119页。

“天留忠骨伴将军”

外城的开篇，从与袁崇焕有关的故事说起。袁崇焕之事发生在清朝入关前夕，那时北京无论内城外城都还为大明王朝的皇帝与子民占据，满洲宗室王公、八旗子弟尚未入城，所以这是本书中发生最早的一个故事。

袁崇焕（1584—1630），广西藤县籍，东莞人。明朝万历己未进士，任福建邵武县令。天启朝升兵部职方司主事，监军山海关外，曾坚守危在旦夕的宁远孤城（今辽宁兴城），一战而击退身经百战、战无不胜的后金汗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既死，太宗皇太极继位，袁崇焕被明廷授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事务，对辽东事务，采取以和为守，以守为攻，乘机出战，以和谈为配合的方针，遭明廷指摘为“欺君”、“诱敌胁和”等罪名。崇祯三年（1630）清兵绕开山海关大路，由蒙古地经大安口入遵化，京师震动，举城戒严，袁崇焕率辽军入援，崇祯帝中皇太极所施反间计，以袁崇焕通敌罪将其下狱，于京城西市凌迟身死。崇祯这一自毁长城的昏庸之举，终于导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崇祯皇帝本人也自缢煤山的历史悲剧。

据《明史·袁崇焕传》：“（崇祯）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卷二五九）事实上，当时北京市民并未认为袁是冤屈的：“明年四月，诏磔西市，时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剥者也。”（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袁之惨状与北京市民因不知情而表现出的仇恨与残忍，如今读来，仍令人心悸。

袁崇焕的冤案曾引得无数英雄感叹歔歔，我国近代最出名的文论家梁启超将他称为“明季第一重要人物”，他说广东地处岭表，在中国历史上鲜有如此“足以当一国之人物”。^①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之人，袁崇焕及其与之相关的故事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因“驱逐

① 梁启超：《袁崇焕传》，收入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需要而再次应运而生，而且迄至如今，仍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它又是本书中绵延最久的一个故事。

在围绕袁崇焕发生的诸多故事中，近年流传最广的一个，是袁崇焕被害之后，曾有一位姓余的谋士将他的尸骨（或曰头颅，详见下面的考证）偷偷埋葬于北京城南的广渠门内，余家从此便世世为袁大将军守坟，历明至清，再历民国至解放，再经历“文革”等各种劫难，待终于传到余幼芝女士这里时，已然是第十七代。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近年来也确实感动了无数人。通过电视等新闻媒体的报道，余女士和余家为袁大将军守墓的故事在北京城几乎家喻户晓，仅我从网上搜索的条目已达几千条——尽管我为余女士做第一次访谈时这个故事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广为流传。但与此同时，各种质疑、反对的声浪也开始出现并且越来越高，很多人提出，为袁大将军守墓十七代，这究竟是一件确凿的真事，还是仅仅是一个传奇？余家后人并不仅仅余女士一位，其他人为什么无声无息？更有甚者，对余女士究竟是否真的是余家的后代，也有人提出了怀疑。

我为余女士作过第一次访谈之后，陷入其中已是身不由己，何况这件事已经触及到口述史学科的“软肋”，即口述究竟有多少真实性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正因为任何史料也不可能绝对真实，“校勘”才会成为史家的看家本领，成为史学训练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而口述史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这套功夫也应该同样适用。

我采用的方法无非还是那几个，一个是用文献来与口述互相参证。王国维早就提出过“二重证据法”，讲的是考古发掘资料与文献的互证，口述与文献不也同样是二重证据吗。再者，是取旁证，即寻找其他与此事相关者，听取他们的叙述和看法。还有一个，就是对被访者做深度访谈，并把几次访谈的说法进行前后对比。这三种，我都试了。出于种种考虑，我无法公开所有的访谈纪录，所以这组口述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是我对余女士第一次访谈的记录，第二部分亦即附录，是我将所做的其他访谈与文献互校之后撰写的、对有关史事的几点考证，属于我的考据癖发作，因其枯燥无味，尽可跨过去不看。我要强调的是，这组访谈的重点，既不在于对袁崇焕的评价，也不在于对余家守墓一事的褒贬，而在于我追究“守墓十七代”故事的一个过程，也是我通过这一追究，对口述史研究方法作的一种探讨。坦率地说，这种探究比起这个故事本身，更能引发我的兴趣。

(一) 余幼芝口述

时间：2001年1月18日

地址：北京市崇文区东花市斜街三号袁崇焕祠旧址

被访者：余幼芝

访谈者：定宜庄、岑大利

在场者：焦立江（余幼芝之夫）

【访谈者按】这是我2001年第一次访问余女士之后写的访谈者记。毋庸讳言的是，我当时确实相信余女士所讲为事实，而且确实为袁崇焕和余义士的故事感动）：

余幼芝，退休教师，原居住于北京市崇文区东花市斜街五十三号。此处旧称余家馆，即袁崇焕墓之所在。近十余年来，史学界有关袁崇焕的研究一度成为热门，仅以袁崇焕为专题的学术讨论会便召开过不止一次，余女士夫妇也曾应邀参加。我的同门、中央党校的岑大利教授就是2000年在辽宁兴城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与他们初次相遇的。她回京后对我讲述此事，我感兴趣，便随她一道，在2001年的冬月，冒雪专程到余女士的居所，一则对余女士与她的丈夫作口述访谈，一则瞻仰声名赫赫的袁大将军的英灵寄托处。

与学术会议相比，在被访者家中的谈话，因其特定的情境，感受与气氛自是不同。北京那年冬季多雪，当日京城一片雪雾迷蒙、路滑天寒，余女士那位于胡同中的逼仄潮冷的居所，与她谈话的激越高亢主题构成鲜明对比，至今犹令人难忘。

余女士的口述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第一是余义士盗袁崇焕头及余家后人世代守墓的故事，以及乾隆朝建袁崇焕祠、墓的由来。第二个内容，也是她说得最多的，是“文革”将祠墓毁坏后她奔走上诉的经过。第三个内容，是访谈者与余女士夫妇就民族气节与民族仇恨等敏感问题进行的对话。这是我当时想要做这次访谈的主要目的。从与袁崇焕相关的故事看几百年来的满汉关系，确是一个有意义的角度，因为明清之际的这段历史，毕竟是发生在中华民族内的、距今最近的一次剧烈的民族冲突，如何评价袁崇焕，又是对这一民族矛盾持何种看法与情绪的集中体现。

我们是以清史的研究者和满族人的身份来与余女士交谈的，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议论，以及所谈及的余女士祖父过继给满族家庭一事，细读起来都耐人寻味。

对袁崇焕评价的转折点，应自乾隆四十年（1775）以后开始。自这年之后，清高

宗以“立臣节”为宗旨，实施了一系列表彰为明捐躯的忠臣节烈、将投降清朝的明朝降官列为“贰臣”等举措，寻找袁崇焕的后裔，正是这些行动的组成部分。此时距清军入关已百有余年，清朝统治者已经大体完成了从异族入侵者到泱泱大国君主的角色转换，对他们来说，臣对君的效忠既然已成为保证统治稳定的大事，历史当然也就需要改写。不过，虽然乾隆帝的目的主要是出于稳定统治，但我却毋宁相信，当他细阅《明史》，读到有人壮烈赴死，有人腼颜投降，人格之高下判然可分之时，他对于黄道周等人发出“风节凜然，不愧一代完人”的赞叹，也有真诚的成分在内，因为从他们身上体现的，是在人类的无论哪个民族中，都是最崇高最有尊严的精神。

余女士夫妇面对络绎不绝的访问者时，也在强调这种“民族精神”，这与乾隆帝的口径倒是不谋而合了。明与清、满与汉当年的冲突与交战，在这里已经被淡化，淡化到仅仅成为一种背景。近二三十年来，以“只要符合历史发展的大潮流，即使是投降也应该肯定”作为评价古人功过是非标准的论调，经由一些学者首倡而甚嚣尘上，我则认为，在政治斗争、阶级界限乃至所谓的“历史发展潮流”之上，人格的高下和灵魂的尊卑，也是应该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并作为对人物的评价标准的。

余幼芝（下简称余）：我叫余幼芝，这是我的丈夫焦立江。我们余家在这儿住了十几代人了，原来我们这个院子没有外人，都是余家的，我们这条街叫余家营，后来盗了袁大将军的头以后，街门就变成余家村，不知道为什么又变，就叫余家湾，后来又叫余家馆。一直叫到七几年“破四旧”的时候，当“四旧”给破了，就叫东花市斜街。

我的先祖是袁大将军的一个谋士。我小时候老听我大伯说“谋士”、“谋士”，我以为是磨刀的石头，我想我先祖怎么是石头呢（笑），后来我妈给我写出来，我才知道是“谋士”，所以对这事印象特别的深。现在别的材料有写我们家是马夫的、仆人的，我也不跟人家辩，人有人的写法，学术上的事我不管，采访我，我就按家里传下来的说。我们就是不知道先祖叫什么名字，可惜没有传下来，哪个历史材料都称为余义士。

袁大将军是广东东莞人，什街镇水南乡的人，我们家是广东顺德县马岗村的人，我们既是同乡又是上下级的关系。从南方一到这儿来就跟这儿住。

定：皇太极用反间计把袁崇焕害了的时候，您先祖是和他在一起吗？

余：一直和他在一起。我们余家是都在这儿住家，在这儿买的地。

定：那你们家后代对您先祖怎么盗头的有没有传下什么故事来？

余：那没有，就说冒着满门抄斩的危险，趁夜黑的时候，把袁大将军的头从菜市口

的旗杆子上盗下来，就偷偷地埋在我们的后院里。你想袁大将军是这么一个重臣，罪名又是反叛，当时北京四九城都关闭了，当时在北京的广东人挺多的，跟着袁崇焕做官的人也挺多的，但别人都不敢。唯有我们先祖，深知袁大将军的为人和忠诚。

自从我先祖把头盗了以后，就隐姓埋名，辞官不做，告老还乡，当老百姓了。临终时把我们家人都叫到一起，就跟我们家里人说，我死以后把我埋在袁大将军的旁边，我们家辈辈守墓，我们一辈传一辈，不许回去南方，从此以后再也不许做官，所以我们遵守先祖的遗志和遗愿，一直守在这儿。到我这代已经是第十七代了。从1630年8月16号袁崇焕的忌日，到现在是三百七十一年。

刚盗了头之后什么都不敢修，葬也是我家草草葬的，只有我们一家才知道，连小孩儿都不让知道。谁也不敢往外张扬。为什么我们要隐姓埋名呢，就是因为这个案子一直没有破。崇祯皇帝他得查呀，谁给盗走的就说明他跟袁崇焕是一派的，也得遭一样的迫害。那时候没有祠堂，是我们自己的家跟这儿住。

听老家儿（北京话，指父母）传，因为我们是广东人，凡是住在北京的广东人死了以后就埋在我们这儿来，就把我们后院辟成广东义园。那时没有碑，都是坟头，你也不知道哪个是袁崇焕的。那时墙高着呢，人家就知道我们是看坟的，看广东义园的。

定：你们盗（袁崇焕）头时清军还没入关呢。

余：对。袁大将军跟努尔哈赤打仗，当时满族人就是侵犯我们中原，您是满族，没关系吧？你们少数民族原来住在山海关门外，你们就是侵犯中原，那我们就不干么，各保其主么，是吧（笑）。那时代不知道满族也是咱中华民族的，是不是？要知道何必这么打呢（又笑，大笑）。你侵犯我们，我们就打你，努尔哈赤自起义以来没有任何人把他打败过，唯有袁崇焕把他打败了，袁崇焕以守为攻，死守城池，就是兴城。他拿的武器是西方进步武器，红夷大炮，归根到底这红夷大炮还是咱中国制的，还是东莞袁崇焕的老家制的，让葡萄牙人给买走了。这是我们1994年在广州参加袁大将军四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们讲的。要不说袁崇焕是历史上一个转折的人，如果明朝崇祯不把他杀死，满清进不来，那咱们历史不知道什么样了。

定：那清朝就不知道这事？

余：过了一百五十五年才知道。那就一直到乾隆当政的时候。乾隆皇帝当政以后，发现袁崇焕是个忠臣，一方面他要笼络人心，一方面他也标榜他的先祖皇太极善用计谋，这样他就下诏找人，说谁要找到袁崇焕家里的人，他愿做官，我给他官做，他愿经商，我给他钱让他做买卖，愿意种地，我给他贴地让他种地，谁要找到是谁盗的头，也给予表彰。

定：乾隆皇帝怎么找到您这儿的，有故事吗？

余：反正他先找袁大将军的后代，没有找到。

定：那时候袁大将军的后代跟你们有联系吗？

余：他们没留后代。没有直系后代，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他要有儿有女，可能我们家不给他盗（头）了呢。

定：后来跟他的部下、亲属一点联系也没有，完全断绝了？

余：没有。要不是给我们也端出去了么。乾隆原来还有题词呢，是个匾，就在大门那儿挂着。红卫兵都给砸了嘛。忘了说的什么了。一百五十五年以后袁崇焕才按冤案公诸于世，才公开纪念。清朝给他杀了，不是乾隆皇帝杀的，祖先和后代不能一概而论是吧，我们觉得乾隆皇帝还是个开明皇帝，当然他也有私心，他刚当上皇帝他要笼络人心。

这祠堂是乾隆皇上在我们这房子的基础上，把平房扒了重修的。这是大厅，里边还有一个客厅，喝茶聊天的，客厅比我们大厅还好。我们不在这儿住，在里边院住，房子都是老房子了。

我们家规矩礼节特别重。大祭是清明、七月十五、三十，乾隆以后官员都来参加。三十是早上10点多钟我们就都过去，供我们自己家蒸的米粉肉、米饭、炒菜，供饺子是这么点小盘，一个盘是四个，共四盘，叫做神三鬼四，给死人都是四个，给神仙就都是单数。那时候我伯父还在呢，到清明那天带全家祭祀去，过去是整猪整羊，解放后就按广东习惯弄一只鸡，煮了以后上供去。清明、三十都烧两炷香。唯有到



位于今北京五十九中的袁崇焕墓

袁大都督忌日，我们烧一炷香，是他一人死嘛。一个十月一鬼穿衣，供的东西少点。一个七月十五鬼节，广东人把糊的大船搁到我们门口，从早上10点多钟就供上了，把衣裳什么的都搁船里烧，说七月节就该冷了，就该赶到南方去了，怕江河都冻了赶不上船。规模挺大的，先摆上吃的，由伯父，反正都是那大的，由他烧上香，由他主祭，伙计点上香，大爷接过来插到香炉里，然后就磕头，然后到我们先祖那儿，给我们先祖烧香。然后把酒撒到地上，吃的有的一部分埋到地里头。我们家没有男的，人少，姑娘也都参加，也要戴上帽子。

祭奠袁大将军的时候，我父母他们穿着白，戴着孝，站在棺材前面。那时有钱的人都得念经，要没有大钱就请和尚，七个和尚，五个和尚，或者三个和尚来超度亡灵。那时我们家就念四房经：和尚经，老道经，喇嘛经，姑子经。照片上都有，那时我家有家谱，还有从明朝就留下来的照片。到民国时候，康有为的时候才给立的这碑，吴荣光题的词，他是广东南海人。^①

问：乾隆皇帝发现你们以前的一百五十几年你们干什么？

余：那时候我们这儿是老义园，龙潭湖那儿是新义园。都是埋广东人。我们旧园都埋满了嘛，就在龙潭湖开个新园，请个姓刘的看着那个园。在广安门外还有一大片地，雇人种，请我伯母娘家的弟弟看着，都是我们家的地方。每年我们家种枣树，熟的时候就卖给那枣贩子，好比你包几棵树，就给我家多少钱，你自己打去。我们家还雇个伙计，开作坊，做一种刮活，是一种手工艺的活儿，由蚕吐了丝以后，把丝缠在一个板上，用牛骨头做的刀这么刮，把丝刮成绒，做什么枕头啊，当时出口的。岁数大的老街坊还有干过这个活儿的，那板子呀我还看见过。生活还过得去。我父亲、伯父他们都在家，都不工作。

解放以后清理这些园，我们把三十多间房子、两个院子，还有买卖，都交给国家了，就恐怕落一个地主（就担心被划为地主）。那靠什么生活呢，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由他在北京成立一个广东保管财产委员会，^②他是主委，我们那时都管他叫蔡主委，

^① 按康有为所撰《袁督师庙记》位于广安门内旧存的袁督师庙而并不在此处，详见后面附录中笔者的杂考。南海吴荣光所题墓碑“有明袁大将军墓”位于今北京五十九中学操场一角，即余女士所居的袁崇焕墓、祠所在地，唯题名时间是道光十一年二月而非民国时。

^② 蔡廷锴（1892—1968），广东罗定县人，1932年任国民党十九路军军长兼副总指挥。至于广东保管财产委员会，全名应该是“广东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当时北京市政府颁发了《北京市各省市会馆管理暂行办法》，废除了旧有的会馆管理制度，成立了这个委员会，负责调定会馆房租、对会馆进行必要的修缮保护以及对会馆财产进行检查和重新登记诸事宜。

每个月到他那儿，他给我们二百多斤小米。我就记得跟我母亲坐洋车包月车，到顺德会馆^①，他跟那儿住。到他那儿领小米去。到五几年国家又把房子地都还给我们了。后来我们家又把房子交出去了。

1952年毛主席说要把坟都迁到城外去，我伯父那时还在呢，他就特别着急，就立马儿呀找柳亚子、叶恭绰、章士钊、李济深他们这些人，我们都是广东人哪，^②我伯父跟他们都是老世交似的。这四人给毛主席上的书，叶恭绰执的笔。5月14号上的书，16号毛主席就批给彭真了。毛主席批示是：“请彭真同志查明处理，我意袁崇焕祠若无大碍，应予保存，毛泽东，五月十六日。”^③当时就把我们这儿给重新修了。

那时一到清明，前三天就有人来把院给压平，那真是黄土垫道，清水泼街。中央首长们9点钟就来，下午3点他们才走，跟这儿吃顿中午饭，开个小型的研讨会。邓拓了，吴晗了，我听说周总理也来过，朱德是每年必到，英雄爱英雄嘛。吴晗是年年来，他是搞明史的，叶剑英也年年来，他是广东人哪。

我们这儿现在环境不好，这院子根本就面目全非了。1955年时候由教育局和人民政府跟我的伯父谈，说你们的地方特别大，要在这儿盖一个学校，我们家都是读书人，我先祖就说过要我们读书，读书好明白事理，好知道怎么样报效祖国。做人并不难，做一个好人坏人的问题。所以从明朝到现在我们家是读书人。并且我们生在崇文区长在崇文区，也知道唯有崇文区最落后，龙须沟不就在我们这儿么，净是抬大杠的，搬大煤子儿的，捡煤核的，拉洋车的，倒水的，都是干这个的。要提高这些人的素质，就得学习。所以我们伯父就答应了，把我们后院落的一角就给了中学了。那时我们还在里边住呢，我们就从里院搬到外院去了。这屋是我爸爸的亲姐姐住，南房是我表嫂，都是姓余的。

定：你们叫余家营子，这儿就应该有好多好多姓余的了。

① 顺德今为广东省佛山市的一个区，所以余女士称“我们”。顺德会馆位于宣武区宣外大街东侧的海柏胡同。清初著名学者和诗人朱彝尊曾在此居住。今以“朱彝尊故居”而著名。

② 这几人都是解放后的著名民主人士，但除叶恭绰外，都并不是广东人。其中叶恭绰（1881—1968）是广东番禺人，为中国当代书画大家，解放后曾任中国画院院长；柳亚子（1887—1958）为江苏吴江县人，爱国民主人士、诗人；李济深（1885—1959）为广西苍梧人，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章士钊（1881—1973）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

③ 毛泽东致叶恭绰信原文是：“……近日又接先生等四人来信，说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此事嗣后请与彭真市长接洽为荷”，时间为5月25日。载《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3—434页。

余：不是，是因为地方都是我们家的。我们家还有个特殊的情况，我们一直没有搬过家，按说也该有好几千口、好几万口人了吧，可是到现在我们家才六口人，因为我们家是代代单传。乾隆皇帝没有发现我们的时候就单传，人一直不多。我们家没有活过七十的，都是五十多岁六十多岁就死了，我大爷是六十三岁，我伯母是六十多岁。还一件我们家没有得过慢性病的，都是得病就死，倒不受罪。我老祖是一个人。我爷爷是老哥儿七个，可是就剩我爷爷一个人了，并且我爷爷还过继给人家了，叫余恩兆。我们家姑娘特别多，我有三个姑奶奶。我父亲1948年就死了。我母亲生了十个孩子，我行九，我有六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我妹妹要活着今年都六十了，都死掉了，一天就死俩，上午死我姐姐，下午死一个七岁的哥哥，死得特明白，都死在天花上。现在到我这代，我有两个叔伯姐姐，一个叔伯哥哥，一个侄子，侄子有一个小孩儿，就是我侄孙子，就这六个人。我就觉得这可能是天意，上天给余家这个任务，就是守这个墓。要不怎么那么巧呢。哥儿们多了就要分财产、分地产哪，那谁还守墓呀。

按我们祖先的遗志，是让我们默默地守墓，不许声张。为什么今天都知道这事儿呢，就是因为有这场十年浩劫。“文革”红卫兵打进来了，您说这种情况谁敢说什么呀。1966年我正在坐月子，半个多月回来，婆母说把袁大将军的墓给刨了，我趁夜里偷偷去看了一眼，我心里就特别难过（哭），我们余家世代代守卫的民族英雄，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光荣，他是为人民死的，为保卫北京死的，北京人为什么把他给打倒呢。我真不理解。我一个小市民也制止不了，只能在心里安慰袁大将军，有朝一日我一定把这墓修起来。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心里老是不忘这件事，如果在我这代，第十七代，把这墓恢复不起来，那我上对不起先祖，下对不起子孙后代（仍哭）。我就开始了二十多年的跑，我哪里都去，凡是有关的，文化部、崇文区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政协、全国政协、统战部、民革我都去到了。凡是能够帮我恢复这个墓的各界人士，我都跑到了。因为那时候我是教学的，后来我就搞仪器，我好几次到文物局见局长都没见着，正好有个文物局的人到我这儿修仪器，我就托他带封信，把我的情况跟他说一说。

有人还误解我，说你跑是不是为了你们家呀，是不是为了房子呀，如果是为这房子我就不跑了，我就搬走了。我有很好的条件可以搬走的，我那个叔伯哥哥到1970年的时候就搬走了。我有五个姑姑，原来都在我们这院住，后来也搬走了。大伯一家搬走后三十多年没有联系，后来见到一篇文章登在崇文区政协的刊物上，是大伯家女儿余凤芝写